

民主 团结 敬

省政协八届一次会

王宗春主持 郭荣昌作报告 谢

南粤女记者

广东省女记者协会 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编 余碧君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 英 许金丹 朱佩荣

李小瑛 陈文芳

向大力支持《南粤女记者的风采》征文活动及本书出版的顺德市政府致谢

序

丁希凌

在广东新闻界的群众团体中，省女记者协会一成立，就注重做实事，热心为女新闻工作者服务，热心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服务。工作的开展，相当活跃，多次为会员评选优秀新闻作品；1996年又举办《南粤女记者的风采》征文比赛，并将获奖和入围的作品以及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品，编辑成《南粤女记者》一书，奉献给新闻界同行，奉献给读者。

《南粤女记者的风采》征文比赛，得到广州地区许多新闻单位女记者的热情支持。无论战斗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女记者，还是已经退下来的女记者，都精心撰写文章，积极参加征文比赛。有几位资深女记者，征文评议结束之后，还根据征文比赛的要求，写出有分量的文章，交给省女记者协会。这种认真对待征文比赛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

对这次征文的评议，省女记者协会和评委们，同样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一丝不苟。先由参加征文比赛的新闻单位初评，然后由评委进行总评。每个评委都仔细阅读了征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按照征文的宗旨、评议的标准，对参评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反复比较，评出获奖的优秀新闻作品。有的作品，虽然没有来得及参加评议，然而的确是优秀新闻作品，也一视同仁，编入书中。

《南粤女记者》一书，大多是写自己，少数则是写别人。这些新闻作品，固然属于回忆性的文章，但不是全面的回

顾、总结，而是把自己在记者生涯中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采访写作中体会最深的东西，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如实地写出来。

《南粤女记者》的显著特点，就是事迹突出，感情真挚，文笔朴实，具体生动，亲切感人，有着较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有些文章，作者一气呵成，有新意，有深度，有文采。你一看，就放不下，非读完不可。由此可见，文章的水平比较高，鲜明地反映了南粤女记者的风采。

从《南粤女记者》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无论是女记者，还是女编辑、女节目主持人，以及担负领导职务的女新闻工作者，的确是广东新闻界的“半边天”。

当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单是参加这次征文比赛，也不单是参加优秀新闻作品的评选，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当中，在执行重大报道任务当中，包括执行特殊性的报道任务当中，充分显示了女新闻工作者的才华。她们成长很快，工作做得很出色。在某些方面，比男新闻工作者还要出色。尤其是她们那种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多么令人敬佩！她们以满腔的热情，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并且具有政治上的敏锐性，能够不失时机地采写一些重要报道。即使遇到艰难险阻，她们也毫无畏惧，知难而上。当你阅读了这本书的时候，就会看得更清楚，体会得更深刻。

当今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近几年，在南粤女新闻工作者中，涌现出一批英雄模范人物，涌现出一批优秀新闻工作者。她们中有的是“韶奋新闻奖”获得者或提名者；有的是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有的是全国“金话筒”获得者；有的是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有的是省劳动模范、省中青年优秀工作者。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举办的“金梭奖”、“金枪奖”、“金话筒奖”，我省的女记者、女编辑、女节目主持人，获此荣誉的就更多一些。

然而，南粤女新闻工作者为什么能够成为新闻界的“半边天”，为什么能够写出优秀的新闻作品，为什么能够成为优秀新闻工作者，主要是由于她们怀着崇高的理想，执着的追求，热爱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因而她们具有一种高尚的精神，就是敬业乐业精神。

有了敬业乐业精神，就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一心扑在新闻工作上，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事业与家庭的关系；有了敬业乐业精神，就有雄心壮志，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断开拓进取；有了敬业乐业精神，就能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怕苦，不怕死，勇往直前，战胜前进中的困难；有了敬业乐业精神，就能够虚心学习，精通新闻业务，勤于采访，勤于写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请看南粤女记者、女编辑、女节目主持人，不正是这样吗？

敬业乐业精神，从本质上来说，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在革命生涯中，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经过长期的锻炼与考验，经过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逐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就能够弘扬敬业乐业精神，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南粤女记者》所选的作品，所记述的南粤女记者的不同经历，所描述的感人至深的事迹，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就是要学习南粤女新闻工作者，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对新闻工作的敬业乐业精神。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提倡敬业乐业精神，越发显得重要。

在新闻事业中，无论男新闻工作者，抑或女新闻工作者，都各有自己的优势，各有自己的所长。自然应当互相学

习，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携手前进。完全相信，男新闻工作者，对于女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界的“半边天”，一定会尊重她们，团结她们，以便发挥各自的优势，各自的所长，共同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有机会先阅读了《南粤女记者》的作品，感触甚深。写了这篇文章，作为序言。愿与南粤女新闻工作者共勉，向南粤女新闻工作者表示良好的祝愿！

目 录

大环境与小气候.....	刘婉玲 (1)
今生当了女记者.....	周晓瑾 (8)
不遗余力的追求	
——记全国第二届“韬奋新闻奖”获得者广东	
电台副台长余碧君.....	张蔚妍 吴 庆 (13)
愿为广播献终身.....	余碧君 (19)
下乡记.....	杜 星 (24)
说一说我们的“眉姐”	陈朝旋 (28)
良知驱我行.....	江艺平 (32)
下辈子我愿再当编辑.....	容洁如 (35)
千里边防行.....	李春晓 (41)
难忘你，朋友.....	陈映平 (46)
笔触写处涌真情	
——记广州市优秀中青年新闻工作者李婉芬	
.....	胡 蓉 黄卓坚 (50)
愿做绿叶扶红花.....	陈武鹰 (53)
深深的爱、不渝的情——吴其琅印象.....	冯慧璇 (55)
一个气质美的女人——王淑明印象.....	曾 瑜 (59)
我与广播的缘.....	陈晓琳 (63)
直播室与记者梦.....	丘丽萍 (68)

感谢生活	陈映平	(71)
在五指山腹地的一次采访	曾端仪	(74)
两上长征路	朱佩荣	(78)
难忘韶山杜鹃红	樊克宁	(84)
等待，是一个漫长而美丽的爱	董滨明	(87)
一篇写了十多年的人物特写	杨淑心	(90)
甜酸苦辣未能忘	关 筠	(95)
娱乐记者赴“会海”	李小瑛	(100)
要为孩子“鼓”与“呼”	邱丽华	(106)
毕生受用的一次采访	陈 平	(108)
追寻时代的足迹	冯 平	(111)
一次特殊的经历	陈婉雯	(115)
亲历“解救”	江曼青	(118)
我的责任心	赖剑修	(123)
竞争中没有女记者，只有记者这个统称	郑穗平	(126)
难忘西藏之行	余素琳	(129)
夜乘“牛卡”进山	刘小芬	(134)
用爱心打开心扉	石 雷	(136)
尝完苦涩享甘甜	张玉涛	(140)
南粤老区行	孙 焰	(143)
我记住了那双亮闪闪的眼睛	彭建芬	(147)
珍藏爱与美的妙味	刘 璞	(151)
初尝成功的喜悦	徐思红	(153)
回忆当年一次有益的尝试	何玉芬	(156)
风风雨雨四十年	郭永华	(158)
穿上了新闻的“红舞鞋”	李清仪	(160)
三十九个春秋	林玉萍	(162)
走杂家的路	叶丽菲	(165)

一个老编辑的足迹	周素梅	(167)
祈求多写几篇“顺眼”之作	吴淑贤	(170)
这难道不是最动人的风采	苏若冰	(173)
珍惜到永远	沈剑琴	(175)
信任与合作	马际童	(178)
乐为他人作嫁衣	甘洁芸	(182)
抑恶扬善 无愧人生	刘淑健	(187)
我为新闻事业默默奉献	梁凤玲	(189)
我是一个兵	陈高龄	(192)
一个极普通的女记者	蔡佩霞	(195)
一个平凡女人的平凡故事	范萍	(199)
风光背后是艰辛	钟玉冰	(204)
忆小谢	魏和平	(208)
永不言悔	宋晓琪	(211)
做一个纯粹的文化人	马志丹	(214)
女制片人和她的栏目	梁朱珠	(216)
苦中有乐 乐在其中	郑珮华	(219)
内疚	何江平	(221)
蓝天上回荡着我们的心声	黄粤心	(223)
当记者与做母亲	张蔚妍	(226)
心路散记	曾佳	(228)

大环境与小气候

刘婉玲

一个新闻记者，要干出点名堂，除了自己努力，还必须有个适宜的环境。既要有好的大环境，又要要有好的小气候。

从 1979 年参加筹备复刊算起，我重返羊城晚报社，已有 16 年了。这些年来，业务上不断有所进展。1984 年，我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出席了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大会。1989 年，经过省女记协和省妇联推选，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领取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被评为高级记者，在全省报刊女记者中实现了零的突破。

难忘的 80 年代

如今的新闻界，人才辈出，后来居上。他们的新鲜经验，值得学习。不过，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也有值得回忆的岁月。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最使我难忘的要算 80 年代，那时的大环境、大气候，对记者的成长和发展有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人们思想解放，敢于思考过去不敢想的问题，许多不敢逾越的“禁区”被冲破。新问题、新事物，一个又一个摆在面前，逼着你去想，去看，去发掘，去传播。这就是机遇。机遇加拼搏，才能有所成就。1983 年至 1988 年，我的新闻作品，几乎年年有奖项。其中，《林孔湘立遗书舍命治“黄龙”》、《我国中医研究当心被别人赶上》、“公共厕所卫生问题”系列报道（合作者为郑珮华），分别被评为全国好新闻一、二、三等奖（同时依次

获得省一、二、一等奖),《从星期六工程师引出的》、《广东植物志命运多舛》获得全省好新闻二等奖。“公共厕所卫生问题”系列报道同时获全国卫生新闻一等奖,《广氮涂层尿素为何养在深闺人未识》获得全国科技新闻二等奖。这些获奖作品,虽不算拔尖,但具有一定质量和社会影响,可以说是当时大环境的产物。

说到大环境,还须提到读者。没有读者的支持,好作品就产生不出来。而读者的状态,也与大环境有关。拨乱反正后,他们敢讲话,讲真话了。通过采访活动,我在读者中间,特别在知识界,交上了许多朋友,其中不少是从报纸上认识的。他们给我反映情况,提供线索,甚至出观点,有些好稿子由此得以产生。

《羊城晚报》复刊后,我写了大量的消息、通讯。有些报道,尤其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讲话的报道,给读者的印象甚深。为群众讲话与读者支持,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你替他说了话,他就信任你。

1983年9月,我写《林孔湘立遗书舍命治“黄龙”》,这条独家新闻的线索,就是一位香港读者提供的。此人叫关棠武,原是广东省农科战线的高级农艺师,文革前遭受磨难,境遇坎坷;文革后出境定居,当了瑞士一家公司农药部的中国地区经理。他是原华南农学院副院长李沛文教授的得意门生,回穗探望老师时,李沛文对他说,著名柑桔专家林孔湘教授身患绝症(胃癌晚期),竟不顾安危,瞒过其夫人,立下遗书交给李沛文,赶去广西防治柑桔“黄龙病”。关棠武听了,感动得流泪,随即给我写信透露这一“绝密”消息。这篇报道发表前,导语中曾如实写上“一位香港读者含着热泪写信给记者”,后来我不想突出自己,便改为“一位读者含着热泪投书报社”。

素不相识的关棠武为什么那么信任我?我想,可能与我写的知识分子问题报道有关。那时,我写了不少为老、中、青知识分子不公平待遇呼喊的稿子。也许这些报道,讲了他想讲的话,引

起了共鸣，使他对记者产生了信任感。

说读者敢讲话，也是相对而言。拨乱反正之初，许多人仍心有余悸。1980年三四月间，我写《捆住手脚的院长真难当》，报道著名精神病专家莫淦明，复职院长后，像一只被拴住的小猫，要“捉老鼠，又没有自由”，连叫一个病人住院，也得党支部书记批准。这一新闻线索，是一次同读者闲聊中发现的。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个普遍性问题——不少地方名义上落实了政策，给专家恢复了头衔，实际上却有名无实。然而进入采访后极不顺利：采访对象不愿意谈；去他家里，家属不欢迎。没法子，只好花了十几个晚上，到医生、护士家去，从旁一点一滴收集材料，最后，感动到当事人也肯开口了。那时广州正发大水，回家路上，有时水浸过膝，只得绕道回府，回到家时已过午夜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稿件见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三四百封读者来信投向报社，大多数叫好并揭露类似问题，自然也有“兴师问罪”的。我们一位记者到中山农村采访，基层干部谈起这篇报道时问：“某记者为何这么大胆，连支部书记也敢批评？”记者说：“不过是个记者呗，她也是我们采访部的支部书记！”这次采访过程，使我悟到一个道理：对读者必须真诚相待，没有一片诚心，他们是不会把实情相告的。

机遇加拼搏

新闻是报道事实的，要反映时代，反映实际。好作品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的大环境。为什么战争年代、社会变革年代，多有精彩之作？就因为那些年代，矛盾冲突尖锐，给作品提供了不寻常的事实基础。但大环境毕竟只是给记者提供了一个外部条件、一个机遇，要写出好作品，还须善于把握机遇，并且还要有一股韧劲，一干到底。

《羊城晚报》复刊后，对办报方针作了补充，提出不仅要指

导生活，而且要干预生活，敢于接触社会问题。这给我印象很深。记者要写出干预生活的文章，必须先了解生活，并且要亲自去体验，切戒人云亦云。因此，我逐渐养成一种习惯：每采访一事，务使自己用眼睛去看，用脑子去想，这样才能真正了解群众，了解事实的真谛。我的许多题目，都是这样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找到的。

1985年冬的一天，我在中山大学采访完，已是下午快下班了，步出校门时，见到几辆小车在接人。一打听，人们悄悄告诉我，是接“星期六工程师”去四乡的。再一了解，原来是科技干部利用每周休息日，到邻近县、市乡镇企业去解决技术难题。他们星期六晚出去，星期日晚赶回来，便有“星期六工程师”之称。当时，乡镇企业大都处在起飞阶段，人才奇缺，即使是普通技术也迫切需要。“星期六工程师”恰恰给他们帮了很大的忙。但许多同志受旧观念的束缚，对这种业余兼职的有偿活动进行种种非难，说什么他们这么搏是“不务正业”，“只是为了挣几个钱”等等，有些科技人员还因此挨整甚至坐牢。所以，这种活动是在“地下”进行的，企业和工程师双方都严格保密，不敢让人知道。我在顺德采访时，有些企业界的的老朋友，就劝我不要“多管闲事”。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在龙江镇的河边，等候分批前来工作的工程师，抓住一起过渡的时间对他们进行采访，两岸来回多次，熬了两个晚上，才得到一些（材）“料”。写这个问题，在报社看法也不尽一致。发第一篇稿时，当天值班编委说：“星期六工程师”这个称呼不规范，不能标在主题上。尽管如此，这组系列报道还是发表了，而且打响了。这些报道，对“星期六工程师”的历史功绩给予肯定，对人们的种种非难进行分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接着，全国各地相继有二十多家报刊（包括通讯社）作了这方面的报道，终于分清了是非，“星期六工程师”的活动，从此堂堂正正地开展起来。在广州，“星期六工程师之

家”的牌子也公开挂出来了。国家科委一位负责人说：提出“星期六工程师”，是广东的一个发明。

在《羊城晚报》，我写的许多报道，都采用了上述这种连续追踪的方法，一旦发现线索，有经营价值，即穷追不舍。这么些年来，我先后发表了八十组提出问题的系列报道，约有二三十万字。这些报道，多半从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个人引发出来，又追踪下去；从人和事追及政策、作风、思想观念、现行体制的缺陷等问题，务求搞个水落石出。这些报道，除涉及较为熟悉的科教领域外，还涉及经济、文化等陌生的领域，而且不少带有批评性，需要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还得冒些风险，有许多周折和麻烦，几乎每一组稿都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由于舍得花工夫，问题抓得较准，大多数报道都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反映广东十年改革开放的《群英谱》（1989年出版）对我的工作有如下评述：“致力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报道，写了一系列稿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1983年秋，省内十多位科技人员曾联名写信给报社，对她提出表扬。许多知识界的朋友经常去拜访她，向她反映情况，或倾吐心声。”

遇到了开明领导

大环境、大气候好，固然有利于记者成长；但在这同时，还要有个宜人的小气候（或叫内环境），记者才能顺利成才。而小气候，情况比较复杂。在实际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开明领导者，给记者创造了可供施展的好环境。但在某些单位、某些时候，面对具体的人和事，却会有思想观念的分歧或偏见，会有人际关系（包括某些人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的困扰，甚至还可能出现“官场”上的怪现象等等。这样，就有一些不正常的事发生。如何处理这些事，对记者的素质往往是一个考验。

晚报复刊之初，在窝棚里办公，艰苦创业。那时，总编辑吴

(有恒)老、许(实)老总很开明、很放手，支持记者去闯。记者发现了好主题，他们及时拍板；在外边遇到了麻烦，他们敢于挺身而出，为记者讲公道话。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批评稿，涉及省里某部门领导干部。材料是经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带队调查核对的，各报记者采访过，《光明日报》登了，广东各大报也登了。但过了一段时间，“气候”发生变化，被批评人有意见，说“搞错了她”。有关部门为此写了七八千字的材料，提出要“平反”。我认为，报道的基本事实站得住脚，便代报社起草一份报告给省委。1985年五六月，许实总编辑要离休了，他对我说：“你那份报告要马上写好，趁我在台上的最后一天，把它发出去。”他签发了这份报告，第二天就离休了。上述那件事也从此了结。领导这样支持正义，记者自然心情舒畅，采访思路越来越宽阔。

1994年初，晚报调整了班子，实行社长制，加强了对业务工作的组织指挥。记者感到有奔头，都争着去抓热点，抓“活鱼”，抓深度报道。这时，我已步入花甲之年，但我从内心感到，自己身上还有一股劲。职业的本能，适宜的气候，促使我禁不住要把劲使出来。过去晚报的机动记者，单打的实力很强，但这些老同志都相继离退休了。1994年3月，机动记者组重组，社长亲自抓，总编辑经常参与策划。我作为组长，把大伙的力量组织起来，互相合作，取长补短，形成拳头打出去，同样相当有力。仅这一年的九个月时间，全组就发表系列报道或长篇报道九组，平均每月有一组。其中，《陪公仆行街》及其姐妹篇《陪公民行街》、《95年广州市形势预析》，分别受到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刊物的赞扬。这两年间，机动记者组采写了《经济新伦理扫描》、《经济新伦理再探》、《都市文化寻踪》、《绿色人际关系》等系列报道。《中国记者》杂志邀集北京有关专家，就这些报道进行研讨，指出这些报道“率先树起一面创建现代都市新文明的旗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传开拓了新的表现形式”。

也有苦恼的时候

认识我的同志，也许以为，我的新闻生涯肯定一帆风顺。其实不然，我也有苦恼的时候。大气候有时不稳定，小气候也不是年年风调雨顺，有些年份，扰人之事，时有发生。同许多记者一样，我经受过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包括来自内部某些压力。

碰到气候欠佳或不愉快的事，我的唯一对策，就是淡泊名利，尽量抛开。我从1982年起，就当了机动记者，到现在已有14个年头，即便在担任晚报编委的3年间，也没有离开这个岗位。我觉得，这个“自由（机动）记者”很适合我，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没有忘记记者的职责。在那几个“多事之秋”，我同样有好作品问世，前面提到的几篇获奖作品，大部分是在那时写下的。直到近年，年纪大了，一样经常到外边跑。1995年7月，我同许挺斐合作，赶赴揭阳采访鞠躬尽瘁、两袖清风的典型人物李楚生的事迹。我们两人仅用了两天半时间，就写出了六七千字的通讯见报。这篇通讯用感人的事实把李楚生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的一生勾画出来，在农业战线，在许多读者中间，留下较深印象。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小气候如何，对记者的成长与发展，确实至关重要。我总认为，对记者的培养，要多做一些扎实的工作。我不赞成加开“小灶”，更不赞成拔苗助长，因为这不是真正爱护记者。但是，如果有人实实在在做出了成绩，并且得到读者认可，他的“顶头上司”就没有理由不持欢迎的态度。否则，同样是不正常，不利于鼓励记者成长的。

往事如烟。我的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但愿有更多像吴老总、许老总以及其他开明领导者那样，为记者成才、成名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使新闻事业更加繁荣兴旺。

（本文作者是羊城晚报社高级记者）